

## 教育部社科司杨光司长的讲话

（2010年6月29日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汤一介先生，尊敬的周其凤校长，尊敬的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

非常高兴能出席今天的大会。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的成立不仅是北大发展历史中的一件盛事，也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和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首先，我谨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对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汤先生及研究院全体师生，也向今天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深深的敬意。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全面继承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促进和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兴盛、发展，形成和传承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和智慧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等，已深深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儒家文化仍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追求和行为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弘扬中华文化，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我们要倍加珍惜儒学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儒家文化的保护和研究，运用儒学的精华和优秀研究成果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北京大学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地和重镇，有着儒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开创我国儒学研究先河的大家，大多与北大有关，他们对近现代儒学的研究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儒学研究，在秉承前辈的治学理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追本溯源、勇于创新，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和视野，积极探索科学的研究方法，着力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的成立，借助北大百年的历史积淀、悠久的学术传承、浓郁的学术氛围以及雄厚的学科专业人才优势，系统整理儒家文化典籍，大力推动儒学研

究开展,精心培养儒学研究人才队伍,对进一步弘扬儒家文化、提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很赞同北大儒学研究院的宗旨:坚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认真吸取各民族文化当中的优秀成果,寻求不同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资源。我相信,围绕这一宗旨,积极整合校内外儒学研究力量,以开展儒家思想的学术研究为中心,突出儒学研究的时代性、世界性和现实性,带动儒学研究的力量和学术队伍建设,北大儒学研究院一定能够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是在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等有关单位的基础上联合组建起来的。儒学研究院的成立,将为推动《儒藏》工程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儒藏》是我国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研究工程,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的重大项目,《儒藏》工程在北大和有关高校的大力支持下,在汤一介先生的精心组织下,先后开展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积极探索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径,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另外,在实施《儒藏》工程的过程中,研究中心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为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的组织管理提供了借鉴。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国内外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四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下的这个重大的学术项目,在组织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完成这一项宏大的学术研究任务,工作中面临的难度和复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坚定信心,精心组织,加大工作力度,加强组织管理。伴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和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实施,《儒藏》工程一定能够得到更多更有力的支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有责任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紧紧依托北大及北大儒学研究院,继续把《儒藏》工程组织好、实施好。我们将从加大经费投资力度、改进科研评价机制、创新重大项目的管理、统筹协调等方面,进一步为《儒藏》工程多办实事,做好服务工作,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加快进度,使《儒藏》成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精神的学术精品和传世佳作。

我衷心地祝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秉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牢固树立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精品意识和创新思想,探索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的成功经验,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据会议录音整理)

## 《儒藏》编纂工程的学术创新与质量突破

【内容提要】《儒藏》编纂工程是教育部2003年批准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由北京大学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承担。目前，《儒藏》精华编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一、传承文明，添三藏新典。《儒藏》工程填补了我国历史上只有《道藏》、《佛藏》而无《儒藏》的空白，实现了中国学者近五百年以来的理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弘扬。二、面向世界，立合作典范。《儒藏》工程组织、联合海内外（包括韩国、日本、越南）众多学者开展了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的国际性合作攻关。参与《儒藏》精华编编纂工作的合作单位国内有30家，海外有24家。三、收书范围突破传统，出版形式适应现代。《儒藏》精华编首次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收书600种，其中不少是首次出版而有重要价值的文献，以附有简明校勘记的标点排印形式出版。四、版本精善，校点确当。在已经出版的36册《儒藏》精华编书稿中，专家评定认为，其选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当，标点之精确，可媲美甚或超越前人。

《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是2003年12月由教育部批准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担任项目首席专家。《儒藏》编纂工程旨在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对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儒家典籍文献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像《佛藏》、《道藏》那样集大成地编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工程计划分《儒藏》“精华编”编纂与《儒藏》“大全编”编纂两步走。先行编纂的“精华编”收录国内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501种，分编282册，并选收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重要的儒学著作150余种，分编48册，共计330册，2亿多字，计划于2012年完成；《儒藏》“大全编”将收录海内外重要的儒家文献近6千种，约15亿字，计划于2022年完成。

《儒藏》规模浩大，选书精善，填补了中国历史上有《道藏》、《佛藏》而无《儒藏》的空白。工程在国家的重视、社会的支持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响应下已经组织和进

行了七年。目前,《儒藏》精华编的编纂进入了中期的攻坚阶段,业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已完成校点的书稿 288 种,其中已出版的有 36 册 73 种;韩国之部已交稿 2 种,日本之部交稿 6 种,越南之部交稿 8 种,计划今年各出版 1 册。

## 一、传承文明,添三藏新典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儒、释、道并称,其中儒家是主流,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深广的影响。然而历代不断编辑《大藏经》和《道藏》,却始终没编成一部《儒藏》,这与儒家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

明清两代学者也曾提出过编纂《儒藏》的建议和设想。明末曹学佺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之鼎立,并采摭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但最终“功未及竣,两京继覆”。清中叶周永年作有《儒藏说》,还具体规划编修事务,但终因工程浩大而没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世界范围的中国文化热也正在兴起,《儒藏》的编纂不仅已经有了良好的时代文化背景,而且也更显得紧迫和必要。党的十七大明确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整个国家文化战略的目标。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戮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宏大的文化事业。

《儒藏》编纂的启动和开展,既顺应了国内国际的时代形势,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弘扬,它不仅实现了中国学者近五百年以来的理想——在《佛藏》、《道藏》之外完成《儒藏》的修纂,也将为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推动世界的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为《儒藏》工程题写的对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正揭示了《儒藏》工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儒藏》的编纂与研究既能起到传承中华文明的作用,又能培养、锻炼一批传统文化和古籍整理的后继人才。

## 二、面向世界,立合作典范

《儒藏》工程是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的国际性合作攻关项目。它依托北京大学现有的学术资源,整合本校人文学科的力量,联合海内外几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数百位学者来共襄胜举。截至目前,参与《儒藏》精华编编纂工作的合作单位有中国大陆高校和科研机构 29 家,台湾地区科研机构 1 家,韩、日、越等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 24 家,总计近 400 位专家学者投入编纂。

《儒藏》工程之所以不称“中华儒藏”,是考虑到儒学不是中国独有的文明,而



是为东亚国家所共有的精神财富。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不仅在历史上深受儒学的影响，而且曾对儒学有过贡献。清廷编纂《四库全书》之际，朝鲜学者李德懋在致中国学者潘庭筠的信中写道：“（《四库全书》）既包罗天下之书，则海外之书如朝鲜、安南、日本、琉球之书，亦为收入耶？”可见当时朝鲜学者已有相当于今天“儒家文化圈”之观念，并渴望将海外儒家著作与中国儒家著作汇编为一体，以便利用。日本学者岛田虔次也说：“孔子的儒家思想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而且是东亚的精神文明。”

因此，我们先后邀请了韩国、日本、越南三国的学者来分别承担《儒藏》精华编域外文献“韩国之部”、“日本之部”、“越南之部”的校点工作。韩国之部由韩国中央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副会长梁承武先生主持、成均馆大学承担，日本之部由日本著名学者户川芳郎教授主持、日本东方学会承担，越南之部由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教授、副校长阮金山主持，校点任务主要由该校中国学中心承担。由于韩、日、越三国历史上的儒学发展各有其特点，保留下来的儒家文献也各有千秋，其选目、分类、整理等方面都无法和中国的情况整齐划一，我们在与三国学者沟通讨论后，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工作。

作为建国以来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国内国外共同合作攻关的首个重大项目，《儒藏》精华编通过七年来的工作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套国内外众多学者协同工作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今后此类科研项目提供可资借鉴的典范。

### 三、收书范围突破传统，出版形式适应现代

《儒藏》的收书范围极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儒藏》精华编不仅收录传世文献，同时还收录了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传统儒家典籍汇编也有收录出土文献的传统，但总量都很小，也都没有独占一个分类，因而影响甚微。《儒藏》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而又各自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这在中国古籍编纂史上尚属首次。《儒藏》精华编国内部分共收书 501 种，其中传世文献 451 种，出土文献 50 种。域外文献部分已确定收录日本文献 49 种、越南文献 11 种、韩国文献约 100 种。这种分类法，有利于保持各类文献的独特性和相对独立性。像《儒藏》精华编已出诸册，以 281 出土文献的专册最受市场欢迎。《儒藏》大全编会沿续精华编的这种编目思路，预计收书 6 千种，约 15 亿字，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仅收书 3461 种，约 7 亿字。可见《儒藏》的编纂既继承了传统，又富于创新，终将成就前无古人的伟业。

在精华编所收 600 余种书籍中，国内部分传世文献精选出的 450 种书籍均系曾经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构筑为儒家文化的精品，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也各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儒藏》精华编所收出土文献目前已有2册50种，其中第281册已于2007年出版，282册尚处在紧张的整理当中。两册收有20世纪初以来历次重大考古所发现的重要儒家文献，包括敦煌遗书、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州汉墓竹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楚简、云梦秦简、阜阳汉简，以及王家台15号秦墓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竹简等。一旦时机、条件成熟，《儒藏》精华编还将增辑第283册，其中拟包括据信学术意义更为重大的清华藏战国简。通过此次整理和出版，一些在先秦时期已发展出来但后世久已遗忘的儒家思想，被重新发现出来。例如孔子、孟子之间这一百年在传世文献中没有书，第281册收录的几种出土文献正好填补了孔子和孟子之间的空白。

《儒藏》精华编所收韩、日、越三国域外文献，都是经过三国学者精挑细选、再由《儒藏》总编纂甄选的精品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是首次进行整理，很多文献更是首次在中国出版。以日本文献为例，《儒藏》精华编日本之部的选目前所未有、“颇有新意”。除了《四库全书》唯一收录的国外学者著作《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外，如太宰春台撰《诗书古传》，以搜罗日本流传的多种中国已逸古籍为主；另有隋代刘炫的《孝经述议》久已失传，林孝一先生花费20年时间从日藏文献中辑出该书的大部分内容，1953年在日本出版，可算是唯一存世的隋代经学著作，而中国学界至今几乎完全不了解，故特编入《儒藏》精华编。日本保留汉籍古本极为丰富，《论语集解考异》、《正平本论语札记》、《宋本尔雅校讹》等校勘著作，大量保留了古本的学术信息，极有价值。而《说文解字疏》在日本也一直只有抄本流传，未正式出版过，这次将由《儒藏》首次出版。

《儒藏》精华编在收书范围和收书特色上突破传统，而在整理和出版的形式上则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面向世界。考虑到让更多的学者和更广大的读者方便地利用儒家文献，并且考虑到现有的科技条件，《儒藏》精华编选择以附有简明校勘记的标点排印而非影印的形式出版。近几十年来，影印古籍已有非常庞大的规模，再次影印势必造成极大的重复，而且不便于现代读者利用。日本出版的佛藏《大正藏》是印有校勘记的断句排印本，尽管问题不少，其利用率还是比各种影印的佛藏高很多。《儒藏》精华编以校点排印的形式出版，便于后人从事研究或者泛泛阅读。通过排印《儒藏》，我们还很容易发展出电子版图书，可以获得一整套校对精良的儒家重要文献的电子文本，更便于全世界的学者利用。

#### 四、版本精善，校点确当

《儒藏》的成败，关键在于质量。已经正式出版的《儒藏》精华编36册，专家评定认为，其选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当，标点之精确，可媲美甚或超越前人。

《〈儒藏〉精华编凡例》规定，校勘当确定内容完足、精确率高的版本为底本，精选有校勘价值的版本为校本。《儒藏》的每一种书稿都经过了有关底本、校本选择的严格审查，确保了版本选择之精善。

由于天灾人祸，国内收藏的相当多的儒学典籍或遗失或毁坏，为此我们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充分发挥海内外合作的资源优势，努力寻求海外的孤本、善本。如已经出版的《儒藏》精华编第104册所收四部著作中，有三种底本来自海外。其中，何晏《论语集解》采用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所藏的双跋本，它是传世《论语集解》版本中最早、最完整的单行本；皇侃《论语义疏》采用日本武内义雄汇校本，保持了抄本皇侃《义疏》的原有体式；而邢昺的《论语注疏》采用的则是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蜀大字本，比阮刻本更完足。

尽管《儒藏》精华编的选目有一部分已有过整理本，但我们并不迷信现有成果，在充分调查书稿版本源流系统的基础上，经过对关键版本的认真比对，决定是否重新选取更精善的本子。如《朱子全书》本《中庸辑略》以明嘉靖中吕信卿毘陵刻本为底本，《儒藏》改用未经删节的宋宁宗庆元初年浙省的官刻本（时朱熹尚在）。又如《十三经注疏》，《儒藏》不以学术界通用的阮元翻刻元十行本作底本的计有7种，可以说已从整体上超过阮刻本：《周易注疏》将经注与疏分开整理，经注用《四部丛刊》影宋本作底本，疏用宋国子监刊单疏本；《尚书正义》、《周礼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用宋浙刊八行本；《孝经正义》用元泰定三年刻本；《论语注疏》用宋蜀大字本。

校勘的目的在于通过底本与校本的校勘，提供一个更可靠、更有价值的文本，从而突破影印的局限；而异文的正确判断与取舍则是校勘质量的关键。《儒藏》精华编的出校原则是：“坚持少而精，以校正误为主，酌校异同。”

对已有过校理的选目，我们在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仍然坚持全部利用原始版本重新核校，纠谬补阙，使校勘质量进一步提高。例如《四书或问》的校勘，《儒藏》本就较《朱子全书》本细致，还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校本。《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也是一个成功范例。此书1997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整理发表，《儒藏》重作校订时在异文判断和取舍上有长足进步。如《公冶长》“乘桴浮于海”句，竹简本“桴”作“泡”，原校认为“泡”误，其实“泡”恰恰保存了古体。又如《论语集注·阳货》“礼云礼云”章“且如置此两倚，一不正，便是无序”，原整理本据别本改“倚”为“椅”，实“倚”

为椅子之“椅”的本字，其义由椅子有靠背可倚靠引伸而来，而“椅”只是假借字，《儒藏》出版时已作纠正。

为了保证校勘和标点的质量，《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制订了初审、通审、复校、复审、终检以及中心工作人员环环抽查、复核等诸多层次的工作流程，各环节人员互相把关、检视错误。每一种书稿所经过的每一个审阅或编校环节，都有对标点的改订和提高。任何古籍整理的标点正确率都不可能百分之百，但《儒藏》从整体上说，首次标点整理的选目，已经力所能及做到了最好，而已有标点本的选目，标点较前人更加精确。如《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仍由中华书局本整理者陈俊民教授整理，订正了数百条标点失当；此外还更换了其中《礼记解》的底本，又补辑了大量佚文。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成果摘报）